

浙江潮

汪精衛的總清算

本 期 目 次

嚴北溟

- 一、新年的禮炮
 - 二、所謂艷電
 - 三、照妖鏡下的汪精衛
 - 四、汪精衛開除黨籍與抗戰前途
 - 五、寶貴的教訓
- 抗戰以來中國經濟烏瞰(續)……駱耕漠
 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試論……蔣炎午
 我們在安吉……鄧 詡
 特 通 訊
 寫 集 體 多 作……曹 華

她們也起來了！



平陽江西南
 英圖書館
 省報

汪精衛的總清算

嚴水信

——一月二日在本社第十七次讀者座談會報告——

一 新年的禮炮

今天是民國二十八年的第二天。在今天，我們大家看到報紙上登載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就是汪精衛被中央永遠開除黨籍了！這件事發生於二十八年的元旦，發生於我們抗戰十八個月後的今日，它是慶祝新年勝利的第一個禮炮，它是這十八個月來流了無數中華優秀兒女鮮血所換來的代價，它是我中央堅決執行抗戰國策對一切妥協投降份子最有力的教訓。這是怎樣值得我們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同胞之興奮感動而熱烈擁護的一回事啊！

同志們！現在誰也清楚地看到：血的鬥爭已勝利地結束了民國二十七年，隨着二十八年新歲的到來，中國抗戰局面在各方面都呈現出嶄新而進步的姿態。這裏，由於我國抗戰的堅決持續，由於日寇對華獨占的日益專橫，推動了整個國際形勢由猶豫動搖的狀態走到積極援華一致反日的道路；由於十八個月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由於全國人民一致的覺醒與努力，國內政治愈走上精誠團結實現民主與普遍動員民衆的正軌；由於日寇物力軍力的大量損耗，國內矛盾的深化，和由於我國抗戰新力量的不斷生長與壯大，敵後方廣泛游擊戰的展開，與運動戰略的運用，使敵人在佔領武漢以後，繼續進攻的威力呈顯出衰頹無力的徵候，以致兩個月來，整個戰局顯出停滯狀態。配合以上國際國內和敵國三種因素的作用，我們的抗戰在一年半的艱苦支持之下，已渡過了第一階段的敵進我退局面，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的相持局面，抗戰的前途已閃耀着無限樂觀勝利的光輝。

不料正在舉國上下一致慶祝這樣一個勝利的新年關頭，汪精衛竟會不顧全國人民的唾棄，厚顏無恥的大倡其對日寇投降妥協的謬論。當他這一謬論在國內遭受各方嚴重的打擊以後，他竟擅離職守，潛逃出國，並在香港發出向中央「建議和平」之荒謬絕倫的絕電。所幸中央國策不渝，乾綱獨斷，已將「通敵求降危害黨國」的罪狀插在汪精衛的頭上而給他永遠開除黨籍了。這是抗戰血史上肅清內部奸逆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二 所謂「艷電」

大家在報紙上可以看到汪精衛那悖謬無恥的艷電。在該電中首先一點就提出向日寇投降乞和的主張：「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一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之闡明，第一點爲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不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照明治維新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爲根基，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這一段話可說一字不移地照抄了日寇近衛文麿的鬼話。我們看了這段話，幾乎弄不清楚汪精衛是不是近衛文麿的化身，或者他的代言人。照汪精衛的說法，似乎日寇十八個月來的瘋狂侵略，強占中國土地，屠殺中國人民，都祇是爲着「善鄰友好」，都祇是要「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循汪精衛這一錯亂荒誕的論調，那麼，不僅是蘆溝橋事變以來，我們十八個月的抗戰是庸人自擾，甚至「九一八」以來八年中敵寇對我血腥的侵略也是子虛烏有了。已往的歷史很明白的教訓了我們：八年以前，敵人曾經大喊着日華親善，保持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然而瀋陽城遭了劫，北大營起了火；「九一八」以後，敵人仍舊花言巧語地聲明無領土野心，然而遼吉黑變了顏色；敵人佔領了東三省以後，仍喊着在錦州建立緩衝區，而同時牠的鐵蹄却已踏進了長城。例子真是說不盡許多，五年來我們的領土不斷的在日寇甜蜜的辭令之下喪失了，我們的國難也日益深重了，這樣纔逼得中國出於最後一戰以求民族的生存。到今天，當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已從血路中殺出一條光明的坦途而漸近最

後勝利的時候，竟不料汪精衛的喪心病狂，還會相信侵略者那一套妖言鬼語，處處爲敵人曲意文飾，不惜顛倒黑白，淆亂人心。這與其說汪精衛想藉此欺騙國人，毋寧說汪精衛以此表示自己賣身投靠的誠款，想邀得日寇主子的寵愛！

汪精衛艷電建議的第二點，是實行廣田三原則之一的共同防共：「以日德意防共協定的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這一點，八年來的歷史也充分教訓了我們：敵人雖然一貫的大喊反共，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他胆敢摠攔社會主義聯蘇的觸鬚，而中國却飽受了敵人侵略蹂躪的創傷。蔣委員長說得很明白：「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借此名義以亡華」，這真是二針見血之語。不僅這樣，我們今天當前唯一的危難是日寇的侵略，當前唯一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這需要我們全民族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職業，不分宗教，一致爲抵禦外侮而精誠團結，凡是抗日的都是共患難同生死的兄弟。因此，我們也就根本沒有防共的必要。蔣委員長十二月廿六日在重慶紀念週講話：「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個人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來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寧使忍受着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寧願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汪精衛看不清這點，到今天還來舊事重提，主張和敵寇締結防共協定，他妄想倒轉歷史的車輪，他妄想抹殺這一年半以來我們正因爲不陷敵人圈套（防共協定）而奮鬥所流的鮮血，他妄想中國仍走上法西斯強盜集團那一亡國的外交路線。這不是汪精衛的糊塗昏聩，看不清時代的演變，就是他故意爲敵寇張目，以欺騙同胞出賣祖國爲快。然而無恥的汪精衛，告訴你吧！中國在蘆溝橋事變以前，不加入防共協定，不走這樣一條亡國的外交路線，今後永遠也不會加入了！永遠也

不會走這一路線了！而且中國抗戰在本質上是一個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神聖戰爭，今後還必然要給全世界所有法西斯侵略強盜以無情的痛擊，讓一切主張日德意外交路線的漢奸們在大時代車輪下碾成齏粉！

汪精衛第三點的建議，是中日經濟提携，這一點也是過去廣田三原則之一，而為我全國人民所堅決反對的。中國在互惠平等的根本原則之下，本來不拒絕與任何國家實行經濟提携，然而日本所謂經濟提携，不僅是貫徹他「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政策，從經濟上榨取中國滅亡中國的陰謀，並且是從政治上破壞中國秩序，妨害中國主權的毒計。過去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日本的具體要求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中國所萬不能接受的。

汪精衛的荒謬無恥，還不止此。他最後一點還建議實施奴化教育，主張中國「今後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換一句話說，不僅中國應成為日本殖民地，不僅中國人應當成為日本的順民，並且更要從文化上泯滅後一代的天良，使子子孫孫俯首帖耳永遠做敵寇的奴隸。汪精衛的祖宗地下有靈，也當放聲一哭吧！

汪精衛曾經是動搖妥協的份子，後來是公開的親日派，現在呢？他賣身做狗，通敵求和，危害黨國的眞面目更是澈底暴露了！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漢奸，有秦檜、吳三桂、洪承疇之流，現在我們的「汪先生」竟和他們一同遺臭萬年了！

三 照妖鏡下的汪精衛

汪精衛過去曾經有過光榮的革命歷史，在黨國有崇高的地位，到了晚年竟悍然走到漢奸賣國賊的末路，也許有很多人會覺得奇怪吧！其實事情有因有果，汪精衛走到今天公開叛賣黨國的結果，是有其必然性的。這可從三方面去考察：第一是汪精衛的本質，第二是汪精衛的歷史估價，第三是汪精衛的錯誤理論。

先從汪精衛的本質說起。

正因為汪精衛曾經有過光榮的革命歷史，在黨國有崇高的地位，他是一個滔滔雄辯的演說家，他會說漂亮話，會寫漂亮文章，還生成一副很漂亮的面孔，雖老而風韻猶存，他混在革命和抗戰陣線內，誰也看不清他的狐狸尾巴。因了這些，「汪先生」三字在一般人腦中過去總會發生過很良好的作用。然而這祇是一般現象上的表示，汪精衛的本質全不是這樣。

汪精衛的本質是怎樣呢？這可以從汪精衛所代表的社會階級意識說起。目前中國正是由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過渡到自由獨立幸福的新中國之轉形期，而汪精衛就代表了這一轉形期內的三種極墮落的人格，分開來說，他代表（一）半封建社會之沒落的士大夫階級，（二）半殖民地社會之反動的買辦階級，（三）抗戰期內的一切親日妥協份子。這三種人格的綜合化，就出現了今日的汪精衛。

就第一點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歷來有一種士大夫階級，因為它經濟基礎的動搖不定，本不能算稱一階級，但這種人在意識形態上確構成另一類型，而立場的動搖不定，以鑽營投機升官發財為整個的人生觀，却是這類人最普遍的特色。在中國封建社會崩潰解體的過程中，此種士大夫階級是沒落了，然而其中得意的一部份却形成了極腐敗的官僚資產階級，代表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在政治上作最後生存的掙扎。汪精衛就是這種官僚資產階級的最好代表人。因為士大夫階級本質上的那種動搖性，決定了他在意識上也是動搖的。總理在日，早在致蔣委員長的手書中說精衛非屢屢任鉅之才；而病榻彌留，且曾沉痛說出：「怕的是敵人會來軟化你們」，這是因為深悉汪精衛的個性，纔有此針對他警惕的遺言。中宣部政治部共同發表的宣言中說得更明白：「汪先生此次行動，在他個人不無原因。過去汪先生在革命過程中，時而表示堅決，時而表現動搖。」

「正因為汪精衛是這樣一個易「軟化」而動搖的人，所以他過去雖

也曾「悲歌燕市」的去炸攝政王，而辛亥革命時卻又反對總理，主張與袁世凱妥協；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汪精衛極力反對總理的「三大政策」，十六年寧漢分裂時，卻又與共產黨聯合反對南京中央政府。其餘如廣州異動，擴大會議等，時而出山，時而稱病，時而出國，數不盡覆雨翻雲極變幻之能事，而賣友求榮，倒是他一貫的拿手好戲。他最近走到極端的漢奸賣國賊的窮途，在程度上雖有深淺之分，在本質上則是他士大夫階級意識——投機善變自私自利之一貫表現，是無足奇異的。

就第二點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中國民族資本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踐踏之下，自然就沒有遂其正常之發展，而不能不帶着一種原始的買辦性，形成了在半殖民地社會畸形發展的一部份買辦資產階級。此種買辦資產階級祇有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纔能存在與發展，因而他不能不和帝國主義者一鼻孔出氣，也因而自始至終希望和帝國主義妥協勾結而不願進行堅決反帝的鬥爭。帝國主義者最怕的，是所謂「赤化」，買辦資產階級所最怕的同樣也是「赤化」。此種人因為看到抗戰與本身階級利益的矛盾，常常一口咬定，認為抗戰只是赤色份子鬧出來的亂子，「國民黨受了共產黨的當」，「將來打勝了，也是共產黨的天下」，而與其鬧到這樣結果，就不如早日停戰，或率性加入防共集團，對內再來一次「剿共」運動，還可保全本階級的利益；至於國家民族是否不因此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那倒是不必關心的事。汪精衛的通電講和，主張和日本締訂防共協定，就是這種心理的充分表現，也是他意識上澈底代表中國最反動的買辦資產階級之明顯例證。

就第三點說，此次中國抗戰的目的，對內在解除數千年封建奴役的命運，對外在掙脫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枷鎖，而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轉變為自由獨立幸福的新中國社會。這一任務是異常艱鉅的，然而也必然會成功的；這是歷史空前偉大的戰爭，也是中華民族最後一次的解放戰爭。在這樣一個歷史飛躍與社會大

突變期中，於是有些人怔住了，模糊了，迷惘了，他們看不清時代的眞確動向，抗戰的光明前途；他們認為最後勝利不過是一句空話，而與其長此打下去，結果還是失敗，倒不如及早投降的好。唯武器論者，亡國論者，民族失敗主義者，都屬於這一派人，而汪精衛就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綜括上面三點，沒落的士大夫階級之特性是動搖，反動的買辦階級之特性是妥協，而一切親日妥協份子的特性是渴望投降。汪精衛在本質上代表了這三重人格，所以他是一個動搖妥協投降的小人，而結果變成了漢奸。

再從歷史上來估價，有許多人誤會了以爲汪精衛最初是革命的，他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其實這是不對的。民元以後，汪精衛所過的，全部是縱橫捭闔的政客生涯，除官運亨通外，並無特殊革命功績可言。在他一生中如果有一件事還值得我們青年敬佩的話，那就是拿炸彈去炸攝政王一個軼事。然而我們應該知道，革命是理智的，不是徒憑感情氣憤所能濟事。當時滿清專制王朝的存在是有其數千年的封建基礎的，正確的革命策略和路線，應該如總理當時那樣，從宣傳組織運動着手，而決不是一個炸彈，打死一兩個旗人所能濟事的。蘇子瞻譏張良博浪椎擊秦皇是匹夫匹婦之勇，就是這個道理。差幸汪精衛當時是一個年輕的俊俏書生，邀得慈禧太后的垂憐，饒了他的性命，不然，汪精衛的革命生涯，不早就斷送了嗎？因此，汪精衛的行動攝政王，其志固可嘉，其方式殊不足取。這祇是一種輕浮的感情衝動，一種痛快主義的發揮，換言之，就是患了左傾幼稚病。我們知道，凡是易患左傾幼稚病的人，必然也最易患右傾糊塗病，譬如杜洛斯基的談革命，表面上比列寧斯達林還要左傾徹底，然而他現在右傾到做國際法西斯的偵探匪徒。汪精衛左傾的時候，能夠憑着青年一鼓的熱忱，高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能夠憑着一時的追求時髦，高喚「革命的向左轉，不革命的滾開去」。然而前而說過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反對總理貫徹

革命主張號召與北洋軍閥袁世凱實行妥協的，不是別人，恰是汪精衛；十三年國民黨實行改組，又倡議反對總理「三大政策」的，不是別人，恰是汪精衛；九一八以後，一貫地執行對日妥協投降的路線，舉如淞滬協定的簽訂，塘沽協定的訂立，又無一而不是汪精衛在他承乏政院兼長外交任內的有名傑作。到了「七七」抗戰爆發以後，汪精衛更是國內和平妥協份子的老大哥，秉承了日本主子的意旨，當每次抗戰遭受部份挫折或小有勝利的時機，即進行對日投降的煽動。所以汪精衛過去的歷史，全部是一個典型的投機份子的歷史，汪精衛的沒落，正說明一切腐化投機的官僚政客的沒落。在抗戰大熔爐中，今天汪精衛之走到漢奸賣國賊的末路，難道不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嗎？

最後從汪精衛的抗戰理論上看。遠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以後，他提出了「長期抵抗」的口號，所謂「長期抵抗」，就是不抵抗政策的代名詞，只是不好公開說出不抵抗的話來，所以講出這樣一個美妙的名詞來欺騙人民。汪精衛的理論就是最善於用這樣漂亮堂皇的幌子來掩蔽其亡國理論的真面目。到了今天，我們全國上下一體，真正實行長期抵抗了，汪精衛卻又來反對抗戰到底，主張中途講和，「長期抵抗」的狐狸尾巴已原形畢現了。

到了抗戰爆發以後，汪精衛又提出了抗戰犧牲論的理論。他認為中國根本是不能抵抗日本的，抗戰的結果，只是中國全部犧牲，「犧牲到不剩一個人，不留一寸土，纔是抗戰目的的達到。」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提倡抗戰要有犧牲精神，沒有甚麼不對，然而汪精衛明明說出「犧牲是抗戰的目的」，他不知我們抗戰的目的是生存而不是犧牲，我們是在死裏求生的，汪精衛祇看到死，沒有看到生，他不獨看不到中華民族可能在這次抗戰中求得永生，而且日本軍閥統治壓迫下大多數的人民也會要在這次戰爭中因革命而翻身，他是更看不到了，無怪他要更進一步地認定中日戰爭的結果，祇是「兩敗俱傷」，祇是「同歸於盡」。照汪精衛的看法，抗戰的結果祇有犧牲，那根本就不需要抵抗，然而所以發生抗戰者，

祇是因為日本侵略的加緊，不犧牲也是亡，不如拚着犧牲再亡來得痛快些。這樣，我們偉大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也就成了一時痛快主義的發揮，變成了賭博性的孤注一擲。這種理論不僅否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甚至根本否定了抗戰勝利的可能。這樣，汪精衛在理論上，實在是百分之百地偷運了日寇漢奸的亡國理論，是道地的日本貨！

不僅這樣，他最初還高喚其「焦土抗戰」的口號，以為中國抗戰應當把所有一切化為焦土，使敵寇無所收穫，這樣去消極的打擊敵人。這點從表面上看，也似乎汪精衛是個很高明的民族革命戰略家，然而汪精衛的用意却是別有所在的，透澈的說，他想用這種方法來動搖一部份有資產的人，增加他們對抗戰的恐懼心理，才好從各方面來破壞抗戰。我們應該指出：焦土抗戰與堅壁清野是同樣的意義，在原則上本是對的，它的目標是困擾敵人，利用焦土的辦法，使敵人存身不住，換句話說，用焦土來保全其餘的國土，用焦土來爭取最後的勝利。但是汪精衛却片面地強調了「焦土」的意義，把焦土政策曲解為「人與地俱成灰燼，直到中國沒有一個人一寸土」，這樣來增加人民對抗戰的恐怖心，以遂行其破壞陰謀。

汪先生變幻真多，在武漢失守長沙大火以後，他又轉過來反對焦土抗戰了。長沙大火正如當局所宣示的：把準備行動的命令誤解為實際行動的命令，其過咎是應該歸當地軍政當局負責的，而決不是一「焦土抗戰」在戰略上本身的錯誤。在土地失守以前，實行焦土，避免物力資敵，這一個原則則是絕對正確的。汪精衛抓住了湖南地方當局的弱點，對焦土抗戰大肆其抨擊，這正表現出他懼怕犧牲渴望投降的鬼胎。在這裏可以看出：汪精衛過去的主張「焦土抗戰」，和最近的反對「焦土抗戰」，並不是他前後判若二人，而是他反對抗戰破壞抗戰之潛意識的一貫反映。

第四點是他對游擊戰的反對。他在不久以前曾經發表一篇文章，叫做「全面戰爭」，否定了游擊戰的意義，斥為流氓行動。同時

故意強調敵人對於點線佔領的作用，說敵人一定可由點線的佔領，控制全面，並進而達到全面的佔領，因此游擊戰爭是不中用的，我們一定要運用正規戰去和敵人做爭取點線的工作。這一理論的錯誤在那裏呢？中國目前因兵器武備還趕不上敵人，還不和敵人作單純正規戰的死拚，而需要配合廣泛的游擊戰，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十八個月來抗戰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游擊戰對我們的抗戰是有決定意義的，並且已經發展到使敵人日夜焦慮苦惱的嚴重程度。汪精衛之反對平面的游擊戰，肯定中國只有點線爭奪的正規戰纔可以制勝敵人，事實上就無異說不獨點線應讓敵人佔領，就連廣大的平面也應拱手奉送敵人，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應俯首帖耳地做日本人的牛馬。這是何等陰毒的漢奸論調！無奈游擊戰在第二期抗戰中已日增其重要性，最近軍事最高當局已將所有淪陷區在名義上一律改為游擊區，就是明證。汪精衛的企圖中傷抗戰，想替日寇解除苦惱，祇是心勞日拙而已！

第五是他最近對海通社記者的談話，聲明中國自始至終未關閉調停之門。這更顯明的在替日寇代言了。蔣委員長在抗戰初起的時候，就已經以最堅決的語氣封閉調停門戶：「中途妥協便是滅亡」；而汪精衛倒隨時想打開這條滅亡之門，現出他和領袖言論不一致的地方。因為他忝居副總裁的地位，無異領袖的股肱，過去確有許多誤解他的言論可以代表領袖，代表中央，現在汪精衛的漢奸原形畢現，總算給人以真相大白了。

所以從理論上看，汪精衛一貫是漢奸理論的散播者。今天汪精衛走到公開賣國的階段也是有其理論的根據的。

根據以上本質、歷史估價，和錯誤理論三方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汪精衛做漢奸的來龍去脈，決不是偶然的。循汪精衛漢奸路線的發展，是可能進一步去做敵寇御用下的傀儡，和溥儀王克敏梁志鴻輩合流的，然而這祇不過表示汪精衛走進墳墓的愉快而已！

照上看來，汪精衛的永遠開除黨籍，是有着以下幾點最重大的意義，對抗戰前途都是有極良好的影響的：

第一是表現國民黨的偉大進步。許多反動腐化的份子，要想最有效地進行破壞革命的工作，只有混入革命的政黨中，一方面潛藏在革命的旗幟下搖旗吶喊，一方面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革命的工作，特別是像國民黨這樣一個掌握政權的政黨，更有許多投機份子混跡進來，圖謀利祿。不但這樣，革命本來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我們的對日抗戰尤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長期艱苦的過程中，也必然有許多意志不堅定的落伍份子動搖起來，腐化起來，甚至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而不惜認敵為友，認賊作父。這些混跡進來的反動份子，圖謀利祿的投機份子，動搖墮落的落伍份子，保留在革命陣營中，是破壞革命的禍根，是革命最大的危機。所以一個健全的革命政黨要不斷地展開自己內部對一切腐化惡化份子的鬥爭，把這些身內毒素清除去，只有經過這樣嚴厲無情的不斷鬥爭與鍛鍊，黨纔能日趨於健全與強大。拿蘇聯來做例子，有對托洛斯基與布哈林等機會主義反動份子的鬥爭；拿最近中國共產黨來舉例，也有張國燾的被開除。國民黨目前自願抗戰建國的艱鉅任務，要想完成這一艱鉅的任務，就一定要使本身從對腐惡份子的鬥爭中壯大起來，健全起來，進步起來。汪精衛的被毅然開除黨籍，正是國民黨這種偉大進步的表現。

前面說過了，汪精衛自始就是投機政客，封建官僚，而不是忠實於民族國家的同志，目前叛變通敵是有其發展的必然性的；國民黨為肅清內部，整飭陣容，而來一個大檢舉，大肅清，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在新年慶賀聲中，國民黨有此嶄新的偉大的進步，其前途無限的光明，實在值得我們頂禮以預祝。

四 汪精衛開除黨籍與抗戰前途

第二是表現抗戰國策的絕對堅定。堅持持久戰，堅持抗戰到底，本來是「七七」以來我國既定的國策，但是由於內部仍有少數動搖妥協份子的存在，由於少數漢奸親日派的隱藏在抗戰陣營以內，進行中傷抗戰的陰謀，所以每當抗戰一到緊急的重要關頭，和平妥協的空氣總要乘機昂揚起來。固然，每一次和平妥協的空氣都在最高領袖的嚴正關斥與全國民衆一致的唾棄之下而烟消雲散了，然而其動搖人心的惡影響是不可勝言的。汪精衛的被開除，是和平妥協陰謀最後的總失敗。這昭示了全世界：我們抗戰的國策無論如何是不可以動搖的。從此以後，抗戰的步調是更踏實，更沉着了！

第三是表現中央在戰時執行黨紀國法的森嚴。在目前「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最高原則之下，如果有破壞抗戰力量的份子，一定要拿最嚴厲的國法處置他。不管他過去地位如何高，不管他過去革命歷史如何悠久，不管他所代表的殘餘勢力有多麼雄厚，都是應該毫不留情鐵面無私的予以嚴厲的懲懲。古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在目前就要用重典去對付一切妥協求和的民族敗類。因此不管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副總裁，不管他是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不管他是國民黨政會的議長，一到了發現他有背叛黨國的行為，就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開除他的黨籍。中央此種毅然決然的大英斷，是值得我們民衆熱烈擁護的，而我們相信這樣森嚴的法紀之下，一定可以使一般漢奸們伏下去。所以汪精衛的開除黨籍，不僅不是抗戰力量的削弱，正相反，還是抗戰力量的增強。

我們可以看蘇聯偉大的成功，就在不斷的制裁反革命份子。過去的杜洛斯基，也有他相當的革命歷史，但因為思想的錯誤，行動的錯誤，不能不給他開除黨籍，驅逐出國；後來蘇聯還有許多的案子，許多有光榮革命歷史的人在不斷的被肅清出去。他們都是參加革命的，蘇聯的人民並不因此而留情，他們毫不客氣的執行他的國法和黨紀，使黨內國內的組織更加合理，更加健全。所以革命時期，特別是戰爭時期，法紀是非常森嚴的，汪精衛這種反革命份子的

應受嚴厲制裁，毫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我們希望中央繼續這種精神，堅決執行法紀來肅清一切有形無形的漢奸賣國賊。因為許多漢奸份子的混身抗戰陣線內，像汪精衛一樣的人，不能說已經沒有，我們不應過低估計這班人的力量，他們破壞抗戰雖不足，而動搖人心，給抗戰以或多或少的不利影響是可能的。所以事實上我們還得以十二萬分的努力，堅決進行肅奸運動，這是我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第四是說明了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政治進攻的總失敗。日本帝國主義者六十年來壓迫中國的一貫方針，是「以華制華」的兇毒陰謀，在歷史上除了「甲午」「一二八」「長城」「綏遠」幾次很短的戰爭外，長期的進攻方式是「政治進攻」。這種政治進攻比軍事上的進攻更要來得厲害，來得惡毒。因為軍事的進攻是有形的，容易防備的，政治進攻是無形的，不容易防備的，是要從根本上來動搖中國生存的基礎。敵寇的政治進攻有兩種最重要的方式：第一種就是教唆潛伏在抗戰陣營中的漢奸親日派進行和平妥協的陰謀，誘脅中國中途屈服。汪精衛正是這種政治進攻的良好工具，所以在武漢佔領以後，就愈益加緊其投降屈服的煽動。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表明了最高領袖與中央當局以及全國民衆對抗戰到底既定國策的嚴正立場。敵人這一政治進攻的新陰謀是完全失敗了！而且也永遠失敗了！不僅這樣，汪精衛的公然通敵，致被開除黨籍，更明顯的告訴了我們：由於我們抗戰到底的堅決性，由於抗戰的日益接近勝利；使漢奸親日派不可能再隱匿在抗日的旗幟之下，繼續其暗中破壞之工作，而只有走到公開叛變的道路了！抗戰陣容從此更整齊了，也更鞏固了！

第五是國內團結的加強。日寇政治進攻的第二個方法，就是分裂我們內部的團結，實施他以華制華的毒計。民國以來，日寇一貫利用這一策略，製造中國的分裂，坐收了許多漁人之利。一直到西安事變解決，敵人政治進攻的分裂陰謀第一次遭遇到空前的失敗。

於是發動了七七的蘆溝橋事變。抗戰以來，敵人還不斷地想使用他的老法寶，然而由於我民族空前的覺醒，我們已經洞燭其奸了。這次汪精衛的提議中日締結共同防共協定，遭受到中樞嚴正的拒斥，說明了敵人陰謀又一次空前的失敗。同時蔣委員長並堅決的表示：「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顯示了國內團結的鞏固，教訓了一切甘為日寇爪牙破壞團結的漢奸，結果就祇有自棄於人民，自絕於黨國。最後，汪精衛的背叛黨國更深刻的教訓了全國人民，挑撥離間破壞團結，是日寇漢奸的毒計，全國各抗日黨派人民應當從此更親密的團結起來，粉碎敵人的陰謀！

第六是揭破了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漢奸面目。前節指出了，汪精衛一貫是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散播者。汪精衛危害黨國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理論的毒害，證明了民族失敗主義發展的必然前途就是漢奸賣國賊的道路，汪精衛的被開除黨籍，無論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粉碎了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的根據。

第七是愈加激勵了全國的民心士氣。從全國人民對抗戰的信念與前方的士氣來說，此次汪精衛的被開除，也無異是一副興奮劑。抗戰十八個月了，數十萬方里土地的失陷，百餘萬將士的傷亡，數百萬人民的犧牲，數十萬萬財產的損失，這為的是甚麼！還不是整個民族國家的生存！假定當前線將士正在浴血苦戰犧牲殉國的時候，正當全國人民衆輸將出力盡瘁救亡的時候，後方又忽傳來了對敵妥協求和的消息，這將是如何的渙散民心，頹喪士氣？更將何以對得住那些已死的忠勇將士？！汪精衛倒行逆施，視國家民族的生存，曾不足以易其個人富貴的迷途，這是稍有血氣而憤慨的事。因此，除了一個汪精衛，定可以平服無數抗戰同胞的憤慨，定可以安慰前線無數英勇將士而益加鼓勵其衝鋒前進，犧牲報國。因為為殺敵而死，為國家民族而死，是死有殊榮的，祇要不中途投降，就沒有一個人是白死，是死無代價；而以個人的死，換得全民族的永生，這又是誰個不願意的呢？

第八是對國際間的良好影響。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可以

昭告全世界人士，首先是所有同情和援助中國抗戰的各民主國家，全世界人民大眾和各被壓迫民族：中國抗戰是不會中途妥協的！我們是為世界和平公理正義而戰，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決不會辜負全世界人士對我們的期望！這更刺激了國際友人對我更廣大的同情而促進國際有利形勢的愈益發展。同時，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也無異告訴一切日寇的幫兇者，其謀打劫中國的法西斯強盜們：你們不要幸災樂禍吧！中國抗戰決不會像你們想像的那樣，可以中途妥協，向你們的盟友屈服。相反，我們一定要驅殺這東方法西斯的瘋狂野獸，讓你們在中華民族的巨人面前發抖！最後，由於汪精衛的被開除，我們也藉此告訴一切對中日戰爭自居中立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的現實主義外交家們：你們不要徘徊觀望吧！中日戰爭決不是你們投機取巧趁火打劫的機會！原來英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一方面是不願日本絕對打勝仗，致驅逐她在華的全部利益，一方面也不願中國絕對打勝仗，怕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成功，會影響大不列顛帝國統治下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因此英國所期望的，最好是中國不勝，日本也不敗，而便利他們走第三條路，那就是停止戰爭，誘脅中國投降。因為戰爭停止了，就不僅日本開發各佔領地需要英國財政上的援助，就是中國政府開發西北西南，也非向英國舉債不可，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他目前借款買軍火給中國的時候，也並不斷絕其在財政上軍火上對日本的接濟，這並不是雙方討好，而是在一面做生意，一面想維持中日戰爭不死不活的局面，以便利他們來走第三條路！——調停。這就是英國紳士所採的最好對付中日戰爭的方式，雖然僅是一個幻想。所不幸的是我們內部居然有汪精衛這類的漢奸，天天在喚「調停之門尚未關閉」，給了英國紳士們的幻想一個更大的誘惑，使他不能保持其徘徊猶豫的騎牆態度。不然的話，假定英國一旦明瞭中日戰爭祇有兩條路給他走——不援日，即援華，祇能在當中選擇一條，而決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時候，我相信那些現實主義外交家是一定要走援華一條路的，因為目前英日矛盾大過中英矛盾，現實主義的算盤是打得極清楚的；換句話說，他明知調停是「此路不通」而為要保全他在遠

抗戰以來中國經濟動態鳥瞰（續）

駱耕漠

中國的工業本來就很脆弱，而且大多都集中在沿海幾個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島、無錫、直接受外資的壓迫和統率。抗戰以來，它所受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是沿海各大城市中的民族工業，因首先遭受日寇砲火的轟擊，可說已摧毀殆盡，或者為日寇所直接佔有，它們與英美資本的聯繫大部份亦告解體；另一方面，部份的民族資本却向內移，樹立起新的國防工業的基礎。所以研究抗戰以來的中國工業，主要就是研究這一對立運動。

當戰事初起時，國內輿論界曾迫切主張「工廠內移」，政府亦加倡導，但是第一當時國內還殘留着「中國不致持久抗戰」的妥協思想，第二政府在實際上還不能很有力地幫助「工廠內移」，所以沿海各廠商真的遷到內地的依然很少，遭摧毀的却佔多數，譬如上海開北「包括全上海工廠數的百分之三十五，而現在完成被毀滅了；公共租界的東區，比較西區有更多的工廠，也同樣被轟炸過；公共租界佔有全上海工廠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包括許多叢集在東西兩區的大規模的紡織廠和其他工廠，竟不能避免這次砲火的損毀……至於南市和浦東合計約佔百分之

二十，差不多一齊被毀滅了。」（見前引馬寅初先生一文）。此外如無錫等地亦完全一樣。同時沿海各城市的工廠，沒有被轟炸的，在被日寇佔領以後，亦全部被沒收被佔有，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我們所曉得的，莫過於無錫的絲業。下面就是十月五日香港大公報所載上海通訊中的一段具體的事實：

「……無錫一部份絲廠，由所謂之「自治會」委員楊高百為代表，於今年六月初與日人鈴木格三郎訂立合作契約，組織「惠民公司」由日人星忠男為總經理，華人張子振為協理，租定振藝、大成、潤康、瑞昌、乾昶、大生、宏餘、振元等八廠先後開工，資本總額為二十萬元，日人出資十分之六。無錫「惠民公司」所屬各廠名義上雖有華人廠長一人，實際上全權由日人所派之工場監督及會計主任掌握，銀錢進出雖一分一厘，非經日人簽字不能支付，華人不過傀儡而已。最近日人方面未徵華人同意，擅將「惠民公司」改組為「中華公司」，資本擴充為八百萬元，日人出資六百萬，華人得將江浙兩省戰區絲廠廠基，及堆棧作資二百萬元。原有一惠民

東的勢力，他就非援助中國驅逐日本獨霸勢力不可。而要使英國探此堅決行動，就祇有我們對外表示更強硬的抗戰到底的決心。現在汪精衛的驅逐出黨，正無異告訴英國紳士說：調停之門早關閉了！至少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已絕對關閉而堵塞了！這樣，因為中國態度的愈堅決，抗戰的愈加緊，從促進英國態度的轉變，進而爭取一切國際友人更多的更切實的援助，是極有把握的事。

從以上八點看來，可見汪精衛的開除黨籍，其意義是何等重大，對抗戰前途又是如何等良好的影響啊！

五 珍貴的教訓

最後我要把汪精衛叛變所得的教訓簡單說明一下，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這次事件教訓了我們：動搖妥協傾向發展的前途，必定要走到漢奸的道路。汪精衛就是很好的例子。從今以後，我們更要把警惕性提到最高的程度，粉碎一切和平妥協的漢奸理論。

第二，這次事件告訴了我們：由於敵人長期侵略的失敗，由於抗戰已逐漸進入第二個階段，使敵人愈益增強其絕望的掙扎，加緊咬使其走狗漢奸從事破壞抗戰的活動，因此我們必須加緊並擴大肅清漢奸的工作，使

公司」之職員均被撤換。「華中公司」總理爲陳開書，協理爲嚴翰卿，程汀梅。今因戰區各絲廠商不願將廠基作股，該公司竟強制行動。今無錫永裕、嘉泰、五豐、鼎昌、泰孚、泰昌、等廠，已爲日人所接收，擅自加工修理，準備於短期內恢復開工，經以上各廠商反對無效。聞「惠民公司」所屬之振藝等八廠，車數共二千五百七十八部，尤爲振藝爲最大，車數五皆八十部云。」

根據以上所述回想起來，當初未將戰區內的工廠很有計劃地遷移出來，實在是很大的損失。不過據說去年十一月我軍退出武漢時，政府對於人口和工廠的疏散已早安排妥當，留給敵人的至差不多是一座空城；可見中國是如何注意過去的致訓而謀不斷的進步。

察：一是沿海工業向內地的推移，一是新的產業投資。據馬寅初先生估計，戰後遷至內地的工廠，以機器工業爲最多，不過內遷的工作機和工具，當初一共也不過一千六百件之譜，每年僅可製造約值二百萬元的貨物，所以是很有限制的。又據去年（廿八年）八月間經濟當局報告，長江一帶的工廠遷往四川的約有五十七家，其中有二十四家爲機製工業，（對於它當局擬貸款一千萬元，以助發展。）十月二十六日上海譯報則更報導得詳細一點，它說「自戰事發生後，沿海各省區，慘遭荼毒，故各大工廠爲保持生產實力，遵政府勸告，多絡繹遷往四川，其業經遷移竣事，並經正式開工者，達六十三家，計機器廠五家，冶金廠廿三家，電力廠與無線電製造廠五家，陶器與玻璃造廠三家，化學工業廠十家，印刷廠七家，織造廠八家，其他工廠二家，其機械共重約二萬五千噸。各廠並在重慶成立「四川工廠聯合會」冀收相互聯繫之效，故今日之四川，已蔚爲工業之重心。」由此可見，工廠內移，在今天也不是毫無成果，其次如新的投資，在今天也有不少是可以注意的，如政府爲解決西南之動力問題，已着手籌設八大電廠，在四川方面，如萬縣北碚電廠正在進行，龍溪河之水力發電廠不日且可成立開工；久大鹽號公司在四川自流井也新創了自貢模範鹽廠。此外，如南洋一帶的僑胞，對於開發西南也異常熱

根絕於中國。

第三，敵人分化中國團結的陰謀是更加厲害了！過去曾經分化中國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曾經分化中國抗日各黨各派的團結，現在更進一步實行分化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團結了！首先有近衛文麿的宣言「與不反日的國民黨政府談判」，暗示了願意與「親日的國民黨」合作，繼之有汪精衛的公然危害黨國，他附和了近衛，做了近衛的奸細內應。這是敵人由「以華制華」進而採用「以黨制黨」之毒計的試售，可是失敗了！汪精衛的被驅逐，就象徵了近衛內閣的倒台。可是敵人這種陰謀是不會停止的，我們只有用更堅強的精誠團結來回答敵人。這種團結不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團結，不但是抗日各黨派的團結，不但是中國國內各民族的團結，並且是各抗日黨派本身內部的團結，首先是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因爲國民黨是今天担负領導抗戰建國艱鉅任務的第一個偉大政黨啊！

抗戰已進入第二階段了，抗戰的前途更光明了！走到日暮途窮的日本帝國主義益盡其黔奴技窮之掙扎，漢奸賣國賊愈益表現其賣身作狗之最後活躍，我們也正需要以堅定到底的抗戰國策，精誠懇摯的團結統一，自由光明的民主政治來克服敵人的垂死掙扎，爭取最後的勝利。二十八年新年的第一件大事，清除賣國賊汪精衛，這是指引我們踏上二十八年抗戰勝利大路的明燈！（完）

烈，像仰光的僑胞，就會有「緝甸華僑與商總會」的組織，並派員入滇考察。華僑實業鉅子胡文虎氏更「以雲南為抗戰後方重地，生產實業亟待開發，前經派參政員胡兆祥氏代表蒞滇考察……茲悉胡文虎等決在滇組織華僑實業公司，預定資本國幣五千萬元，派胡兆祥、黃強、蔡成章等，日內由港赴滇與當局商洽一切，並着手積極籌備。」（十月六日中央日報）至於國內一部份要人和華僑所合組的華西墾殖公司，進行得又更具體一點，額定資本五百萬元，設辦事處於重慶，擬藉以開發西南各省的農墾礦業。這些計劃和籌謀，無疑地會隨時日的進展而一天天地具體起來；最近我國得到英美貸款的援助，則政府當局對於這些計劃的實現，當然也能給以不少幫助，這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需要加以討論，那就是我軍撤退上海以後，上海工業復趨繁盛的作用和評價問題。我們曉得，上海開南南市和滬東滬西的工廠，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曾受到極大的破壞，這在前面已經徵引過，可是自去年（二十七年）春間以來，上海的工廠可復活，有不少還是完全新創的，其速度遠在內地工廠的發展之上。譬如紗業，滬市日夜開班的筆廠就有如左八家：

- 中新工廠 宜昌路九六號
- 中新九廠 澳門路一〇〇號

- 永安三廠 麥根路五十五號
 - 新裕一廠 西蘇州路
 - 新裕二廠 勞勃生路八號
 - 鴻章紗廠 麥根路五十三號
 - 大同紗廠 檳榔路二二三號
 - 勤豐紗廠 杜神父路一六二號
- （九月十四日上海譯報）
- 絲業則更蓬勃一時。據十月五日香港大公報所載上海通訊，上海租界以內的絲廠，除原有北成都路之怡和（車數六四二部），阿拉白司脫路之怡和新（車數四八〇部）二家外，還有下列十四家新設的絲廠）共計車數二五八六部）：

- 連元 膠州路 一四四部
 - 福陵 檳榔路 一五二部
 - 連成 檳榔路 一五六部
 - 建業 檳榔路 一六二部
 - 越興 檳榔路 一七六部
 - 豫豐 昌平路 四八部
 - 華綸 昌平路 一二八部
 - 上海 小沙渡 一二〇部
 - 同成、曹家渡 三〇〇部
 - 鴻豐 宜昌路 五四〇部
 - 振綸 馬白路 二〇〇部
 - 裕豐 星加坡路 一五〇部
 - 恒慎 大西路 八四部
 - 樂昌 澳西路 二二四部
- （註：同成當時尚未開工。）

華商工廠在我軍撤退上海後，又在租界內的樣滋長起來，到底是表示什麼呢？我們對它應該採取何種程度呢？關於這點大公，報曾有社評談到，為研究必要計，我們需要們加以摘引：

「失地不能辦工廠，淪陷區域內不能辦工廠，因為辦工廠，便不能不和日本人合作，便不能不受日本政府或別種不正當的機關統制。即使自由辦廠，原料的取給，成品的輸運，在在經過他人之手，運費的繳納，捐稅的抽收，以及種種不良待遇的忍受，試問有血氣有赤忱的實業家，誰願經營這種內心苦痛的事業？可是在上海租界上辦工廠，我們的觀點，決不如此，上海租界，是中華民國政府租給外國政府的，中華民國存在一天，我們的主權便存在一天，既不能視為失地，更不應認做淪陷區域，一切限制及非法待遇，還沒有發現過，以故在租界上辦工廠，當然和已往情形沒有分別。我們根據從前政府所頒布的國貨標準，如果是國人資本，國人經營，本國工人，當然認他們的出品是國貨，是純粹國貨。」

最近政府獎勵工廠內遷，頒布種種辦法，提携贊助，不遺餘力，這不能不佩服當局維護工業的一片苦心，可是在租界上辦工業的，尚還沒有得到政府當局之十分諒解……影響所及，國貨行銷甚廣的南洋各地，便發生了一種懷疑的態度，有幾處地方，也

豎起了抵制失地貨品的旗號，如果是新加坡僑商所持的態度，這種情形，實予租界上工廠以巨大的打擊，為目前國貨工業的致命傷。我們認為這一點不能不替國貨工業略為申說。

我們遇到許多的工業界領袖，他們都說在今日工業創巨痛深之下，國內交通，日見艱難，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為未來安全計，為一勞永逸計，為避免種種麻煩與內心痛苦計，誰不願把工廠任內搬移，誰不願在內地去安心建設新的工廠。可是理論是一事，實際經營又是一事。某工業家說：「截至目前為止，內遷的工廠，不算少數，可是已遷二工廠，十之八九都感到不便，都覺得內遷問題的困難，決非始料所及。儘管有許多工廠，能排除困難，不為艱難困苦所征服；但是所得的教訓，已夠未來的工廠有所趨避」。某工廠領袖說：「在內地辦工廠，並不是不可能的，不過倒要退二三十年，把二三十年前的眼光，二三十年前的環境來辦理；那麼，也許不致心灰意懶，或感到種種失望」。某工業家說：「在內地辦工廠，最好不存奢望，不就望有大的收穫，不妨從小處着手，遠處着眼，待到環境改善，情勢變換，自然水到渠成，得心應手了」。某工業家說：「在內地辦工業，不必下大資本，不必把完全的力量集中在一處，最好先設一分廠，或規模的工廠，利用半機械半手工沒方法，遷

就環境，逐步進行，或者容易討好。」

由上種種，我們感覺到地與租界的設施，決不是相背，實在是相成相濟；上海租界辦工廠與香港九龍辦工廠，一是不得已的辦法，惟其在內地辦廠的艱難，我們便要體諒租界上一般經營工廠的苦心。何況在目前交通機構沒有健全的時代，內外的阻隔程度很深，上海的工業品，有一大部份還可補救種種缺陷，同時還可輸往外洋，以挽救外匯上的損失呢？不過我們對於租界工廠的出品，要用堅壁清野的政策，要絕對嚴格，絕對清激，凡冒充國貨，或改頭換面，或以偽亂真，種種奸商的卑劣伎倆，一概要嚴格檢查，杜漸防微，絲毫不可苟且，更絲毫不可通融。皂白既分，徑渭自清，這實在是積極的維護國貨……」

（註：十月五日該報社評。）

對於大公報的一段評論，我認為有妥當的部份，也有不妥當的部份。它說「內地與租界的設施，決不是相背，實在是相成相濟」；因而它又主張政府當局應諒解「在租界上辦工廠的」，對於自租界輸入內地的國貨，只要設立機關加以查驗就行了，而不應以「失地來貨」論，這些，我認為是中肯的。不過它說上海一如過去，既在「在租界上工廠，當然和已往情形沒有分別」；同時它又替同許多工業界領袖的哀訴，如到內地辦廠十分艱難，只能慢做、小做，不能奢望有大的收穫等等，這些，我認為却有很大的遮弊。

因為第一，上海自抗戰後，特別自我軍撤退上海後，雖然還是一樣地在我主權之下，但所受日寇的控制和未來大戰的威脅，無疑地已與過去大大不同，這是我應該及早戒備的；第二，在現在上海租界內設施，雖然和失地淪陷區中不同，但是實際上也不是和過去一樣自由的，至少在原料供給方面（特別是絲和棉花，它們大多取自江浙和冀魯），受日寇的操縱或仰賴於日寇的地方可能是很多的，誰能武斷新設絲廠的背後沒有日寇的魔手呢？受敵指使的奸商難道會沒有嗎？第三，到內地設廠當然是艱難的，收穫是不會很大很快的，但是要為家族培養持久抗戰的經濟基礎，却必需經過這條路。前方將士那樣犧牲，廠商多受些磨折乃至損失又有何妨呢？至收穫（意即收益賺錢）小而慢，那當然更不應計較了。所以我認為綜合前述三點，我們雖然不願將來自租界內的國貨過激地作為「失地來貨」處置，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些租界內的廠商是非常缺乏民族企業精神的，他們的事業成果將來很可能為敵利用（或者現在即已開始），所以我們必須同時採取抑制的辦法，光是在各省進口要埠設局查試是不夠的。同時大公報的這一社評，至少在客觀上是要助長民族資本在今日的上海租界內繼續作買辦性（甚至受日資利用）的活動的傾向，並使內地獨立的民族資本成長遲鈍下來，因為它在客觀上多少為了這樣買辦性的資本作了相當的辯護。這點也值得我們注意的！（節完，全文待續。）

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試論 蔣炎午

在浙江省積極展開政治攻勢的今天，我們興奮地曉得最高軍事會議將所謂「淪陷地區」改稱「游擊戰區」。這是，因為有了游擊的「實」，才取消了淪陷的「名」。

同是中國人，有的在敵人後方打游擊，有的却是在自家後方打「打游擊」的「流寇」。要怪「游擊」兩個字眼生得太不好，竟至使半舊不新的人們引起「流寇」的聯想以及過去的或某種仇恨。因此，我們聽到也看到各種對「游擊戰」的猜忌，中傷，造謠，污蔑。或者，許多夢想永久苟安，嘲笑「游擊」的存在需要，有些又恐惶朝不保夕，罔信「游擊」的發展可能。這情形浙江也沒有例外。事實是誣蔑的最好的反駁。必然要來的事實也將證實現在的「杞憂」。我們必須未雨綢繆，把握現實，多多的估計與準備；因為事前的估計錯誤與準備欠缺，還未得及糾正與充實，比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被動挨打，縛手縛腳的應付總要當得多。

浙江在「全面抗戰，到處發展；真正戰爭，從新開始」（蔣委員長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告全國國民書）當中所處的地位與所負的任務，已得有全浙人士普遍的注意與研究。這裏是比較簡單而部分地討論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

（一）武裝部隊 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條件。先簡單地指出這一點——現在的「抗日自衛團隊總司令部」的前身「第三戰區游擊總司令部」的設在浙江，當有其獨特主要的意義。

究竟「建立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與「保衛大浙江」有什麼分別呢？

「保衛大浙江」是防禦的對內的口號。「建立浙江抗日根據地」却是進攻的對外的亟待解決與實踐的課題與任務。其實從前說的

「獨特主要的意義」已可看出：「保衛大浙江」與「建立浙江抗日根據地」是一體的兩面；前者掩護而且發動了後者的建立，後者鞏固而且發展了前者的保衛。

抗敵自衛團，保安團隊，這些的組織，與正規大軍的駐防，為的「保衛大浙江」，同時也為的「建立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現在各種「保衛」的部隊，都將成為未來「根據地」的「地區部隊」。抗日根據地與游擊戰區，都由地方部隊，留置部隊與開進部隊這三種部隊形成它的地區部隊。

浙江抗日根據地的地區部隊，顯然將以前二者為主力，而地方部隊更為其主體——決定於浙江的廣大人口，豐饒物產，更加上合理的政治領導。

游擊隊不是流寇，也不是便衣隊，雖然不是正規隊，却需要和正規軍配合作戰。「地區部隊」是同時擔負着作游擊戰與正規戰的兩種任務，特別在浙江是易戰易守之地，浙江境內的部隊也是要能夠戰能守，乃至以攻戰代替防守。建立根據地的目的，為「保存並發揚自身，消耗而消滅敵人」。

「有時雖擁有優勢的兵力，而仍採取防勢者；抑經一度採取防勢後，便完全喪失其積極之意志，而陷於專事防禦者……」（敵文件：對中國軍隊作戰之參考）

確實的我們過去的經驗與教訓太多了，就如南京、杭州的失守，都因為雖擁有優勢之兵力，而仍採取防勢，便完全喪失積極之意志，而陷於各個擊破的挨打狀況。——只知道消極的「保衛」，不積極的「建立抗日根據地」，所以茅山游擊區與海鹽游擊區的建立，却是事後艱辛地「開進」部隊去的。

敵人只管不攻，我們只管空「防」，敵鞏固整頓了，我們疲憊懈怠了，敵人集中主力來攻，我們又防不住了。歷來覆轍如此，因為我們沒有消耗敵人和發揚自己，終於保存也生問題——根據地沒有建立起來——敵人反可迅速逐次消滅我們。

我們不必「枉哉」，可是必須把捉一切良機，趁敵人兵力單薄後防空虛的時際，佔領抗日根據地的前進陣地——鞏固、發展，或恢復游擊戰區。

只有黃主席的「政治進攻」是正確把握住這個警覺的積極實踐性的。

(二)政治動作 決定了戰爭的存在與發展。抗戰以來，大家對於「政治影響與決定軍事」的真理，雖已有沉痛的感覺，而認識只有合理良好的政治動作，才能發動與支持「全面戰」「持久戰」；不知道政治動作最主要的決定了「主動戰」。

「實行政治進攻的目的，一方面在打擊敵人不能在佔領區內自由活動，使其困守多時，毫無所獲；一方面給我們的軍事以一休息、補充、訓練的機會，厚培實力，以供他日實行反攻之用。」(黃主席：論實行政治進攻粉碎敵人政治陰謀)

簡單說來，政治進攻要阻撓敵人自由活動，却開進自己自由活動，就是「主動」。

可是為什麼即在游擊戰區，而且是不能固守的平原地游擊戰區，「雖擁有優勢兵力，而仍採取防勢，完全喪失其積極意志，因陷於」各個擊破的被動挨打狀況呢？

「不可諱言的，平原地區的游擊部隊，大都如此的不主動，因此好的「讓敵人的炮火化有灰燼，這是最可讚揚的焦土(？)抗戰」，差點的「保存民力元氣，使民衆得所憑依自然發生抗日力量，這是抗戰而不焦土(？)」。這兩種說法全是別有用心的人的陰謀毒算，游擊戰失掉了主動性便會陷落這些謀算。

為什麼不主動？因為缺乏政治動作的領導與連鎖，因而不能主動也不願主動；即沒有建立游擊戰根據地的必要條件：「使用武裝部隊並配合民衆以戰勝敵人」又「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力量在內，去發動民衆的抗日戰爭」。

為什麼要建立游擊戰區的根據地？山西的游擊戰區牽制了日寇不能南渡或西渡黃河。浙西的游擊戰區也牽制了敵人不致渡錢塘江。

敵在佔領區的挺進，游擊戰區的加強，以及一切「保衛大浙江」的軍事行動都只是掩護我們建立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的「政治動作」，是游動的戰鬥前哨或先遣前衛——以「政治進攻」的姿態向

敵人「焦土抗戰」「堅壁清野」，同時對自己「動員武裝」生產建設。

尤其在地方部隊與留置部隊蛻變為地區部隊的過程中，「政治進攻」一鼓動，鍛鍊，強化而融化了這一切武裝力量，尤其是配合民衆與發動民衆來戰勝敵人。

未來地區部隊的戰略單位，軍團，配屬相當數量的流動炮兵；這戰役單位，師、旅、團，附有小炮乃至騎兵；而基礎戰鬥單位，突擊大隊(營)。大體上看，這種地區部隊與現在「保衛」部隊並沒有差別，但已有主要的變異，因為有了「政治動作」，故更主動積極。應當另外詳細討論這種「非常軍制」，此處不贅。

(三)地理經濟 浙江省區在中國不能獨成一地理單位，却可分別於數個地理單位；因而浙江境內包含若干小地理單位，同時便渾凝成某種地理單位。

這樣比喻：浙閩贛邊區(仙霞嶺山脈——楓嶺山脈——雁蕩山脈)是「戰略防禦」的主陣地；而以四明山脈，天台山脈，括蒼山脈，會稽山脈諸地區為其前進陣地。

浙贛皖邊區(天目山脈——馬金嶺山脈)為「戰略防禦」的助陣地，更為「政治進攻」及將來「戰略反攻」的策源地；再以茅山山脈，太湖流域(包括杭嘉湖區)為其前進陣地，乃至延伸吳淞江三角洲與黃山山脈等區。

這編成的「浙江境內抗日根據地」的姿態——「保持密切接觸並不斷突擊敵之致命弱點(上海，南京，蕪湖，杭州等大城市)——皖線(京滬，滬杭，蘇嘉，江甯，京杭等鐵道公路)」。這個根據地能不能「保存發揚自己，消耗消滅敵人」？

在浙閩贛邊區是能「休息，補充，訓練，厚培實力，以供他日反攻之用」的；在浙贛皖邊區是能「打擊敵人不能不在佔領區內自由活動，使其困守多時，毫無所獲的」；而在所有的前進陣地或「延伸」區，大都能供養與補充一個軍團或師(即可成「軍區」或「軍分區」)，大的縣區能容一個旅或團與敵人作相對運動或迴旋運動，大的鄉區可以存在與發展突擊大隊。

因此，我們必須依準「政治進攻」的最高原則，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陣地戰次之而互相配合的新戰略，建立並推進適合浙江環境的新經濟政策。他如何作主力的戰略展開，如何規定打擊的主

要方向等等，都是現實給我們的迫切課題。

我們安在吉安

鄧 詠

我們離開金華，是十月二十八號的早上，在路上一共走了八九天，十一月六號下午，才到澤安古城裏，計算起來，到現在已經快有兩個月了，這中間，因為工作的繁忙，很難有時間來寫文章，就是朋友們的來信，也有很多沒有覆，因此，在關心我們的朋友，一定急切地盼望着，希望得到我們一些消息；另一方面，却因為關山阻隔，這裏離開金華各地路途太遠，種種情形，輾轉流傳，使大家不明真相。因此，把兩個月來我們工作的情形，作一個簡略的報告，同時，並且提出，不僅是安吉是前線各縣具有共通性的問題，給於關心前方工作，關心我們的朋友們一個參考，想來不僅可以彌補私人少寫信的缺陷，而且，對於相互了解，對於我們今後工作的推進上，也不無幫助吧。

(一) 調政並健全縣行政機構

如過翻開浙江省全圖就可以看見圖的上

方，有一個小小的縣份，北方與安徽的廣德接壤，這就是安吉，安吉是個三等縣，面積還不到三千里，人口祇有八萬六千多，而且山多地少，居民成份，更為複雜，大約有十四個省份的人民，先後移住在這裏，其中尤以河南，安徽，江蘇為最多，這一個客觀條件，對於工作的展開是有相當困難的。

敵人曾經來過四次，把全縣大部分房屋都燒光了，民衆逃亡的也多，特別是有錢的，和年輕力壯的，都紛紛離開本土，這樣，我們的工作是更加艱苦了。

但是，我們倒不灰心，我們一定要設法來克服這許多困難，首先使我們注意的是縣行政機構的調整與健全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記得剛到安吉城裏那一天，全城只剩下百來個人，住在那臨時搭成的草棚裏，房子都燒掉了，滿城只有叢生的野草，縣政府就燒着街，門口掛了一塊大約是火堆裏找出來的小木板，上面寫着一「安吉縣政府」五個大字。接收縣政府的時候，除掉一個臨時從於潛趕回來的沈縣長外（安吉自抗戰後，更換了四五個縣長了。沈縣長到任八天，便又調去於潛），秘書科長一個也不見，聽說已經好久不來了。此外就是科員，書記，大約一共不到十個人，看看辦公桌上灰塵很厚，而未辦移交的公事已達四五百件，全部武器，只有一枝破木殼槍，五十發子彈，抗日靠牠，自己也靠牠，這樣一個縣政府，實在

同我們在後方的時候所想像的相差太遠。光榮的政治進攻的任務，艱巨的民族解放的巨業，如果要想由這樣一個行政機構來執行，實在是太渺茫了。

區署同鄉鎮保甲，這一串下層行政機構，也同樣陷於莫名其妙的停頓狀態，梅溪區署轄有接連長與吳興的十三個鄉鎮，責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但是，當我們去接收的那一天，區署門口，幾個小孩子在滾銅板，再進去就看見兩個人，穿着長衫短裝，悠然自得地在走象棋，問了他們才知道穿短裝的是區丁，穿長衫的是警察，再進去，到了辦公室，看見兩個約摸五十歲上下的老頭兒，看臉色，似乎有些嗜好，但是，誰曉得一個就是代理區長（原來的區長是他的女婿，因為生病，已久不來區署，現在一切由他負責），另一位就是事務員，等到點交的時候，辦公文具是連紙也沒有一張，未辦公文倒有兩大捆，大約不辦公，最少也有個把月了。這樣一個前線上的區署，又不是我們以前在後方所能想像得到的。

至於鄉鎮保甲的黑暗情形，實在使我這支筆也感到沒有辦法，派伏不公，抽了不公，出錢出力，均憑強取豪奪，老百姓生活在黑暗殘忍之下，對政府的信念根本發生動搖，而政府一切政令的推行，不待說，也十足成了具文。

我們接收的安吉就是這樣的，這個機構

是不會產生力量的。因此，我們首先就着手於本身機構的健全，縣政府區署人員一律更換補充齊全，並且，就各個人的崗位上，積極負起責任，積存的工作很快的處理了。各種工作計劃，辦法擬好了。開始了集體生活，工作會報，一方面分派大批政工隊員，開展鄉村工作，同前保甲機構已有初步的調整，工作的活力開始在各個機構間流動，整個安吉動起來了。

(三) 嚴重的財政問題

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錢」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像目前縣政府這樣一個比較龐大的組織，財政問題如果沒有辦法，一切工作的推進便會感到莫大的困難。

財政與國民經濟是分不開的，國民經濟如果陷於破產，財政上也就沒有辦法，安吉的社會，是曾經遭受敵人四度竄擾的。整個農村經濟已發生動盪，這主要表現於一般農民收入的減少，生活的惡化……等等。因此，安吉財政的困難，正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

不待說：縣政府是一個錢也沒有移交下來，二十七年年度田賦還沒有開征，各種捐稅僅屠宰營業稅繼續征收，每月大約有三百餘元，此外，店鋪捐約有四五百元，其他一概停頓，這種情況，在以前因為開支比較簡少，還不致發生問題，現在却人事擴充，不

得不趕緊設法，否則整個工作，恐怕無法展開。

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是治標治本同時進行，在治標方面，是趕造二十七年年度糧券，開征新賦，整頓各種稅款，追繳舊賦，清查公款公產，同時並節省開支，提倡同人自勤減薪，使開源節流，同時並進。

在治本方面，有個問題是值得大家討論的，即是如何使安吉農村經濟本身活潑，這個問題不解決，人民事實上也沒有能力來完糧繳稅。安吉農村的收入，在抗戰以前主要的是靠米，竹，炭，絲等土產的輸出，但是在目前防止物力資敵，乃是抗戰中重要工作之一，特別是食糧，更不能運入敵區。特別在政府已有嚴厲的禁令，但是，像安吉這樣一個惟靠米的輸出的前線縣份，實在是個難題。

據我們調查所得，敵人並不吃安吉的米（因為沒有黏性）這在敵人到安吉來四次，並沒有吃過安吉的米這點上也可以看出來（安吉的米都是被敵人燒掉的）因此，運米是否就是資敵，的確還是一個值得再加研究的問題。同時，安吉的米也有很多是賣到臨安武康去的。

而且，有一種嚴重的情形我們不能不看到：老百姓明明知道運糧出境是有干禁例的。但是，爲了要用，又不能不設法將食糧運出，因此，偷運，走私的就非常多，這種混

亂的情形，例正便宜了許多雜色隊伍以及鄉鎮公所，各在勢力範圍，設卡抽稅（聽說有個地方，以前每担米要抽二角六分錢的稅。而且一担東西如果經過幾個地方就要繳上幾次的稅。

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們在幾個主要的出入口設立了檢查處，東西運出，必須要有正式的證明文件（例如上次武康縣政府曾向本縣採購大批米穀）經過檢查，才可放行，這完全是爲了防止資敵，同時，從戰區來的入口貨物，也必須受嚴格的檢查，而在各種貨物色的出入口時，須酌量繳納抗衛捐，這樣一來，整個農村經濟有了一條基本的出路，人民的負擔既不加重而且使之合理，抗戰經費也可以有相當的辦法。

(三) 前線應否徵兵

中國必須以最堅決的持久抗戰，才能戰勝敵人這點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在這個持久抗戰中，最基本這問題：乃是如何源源地補充兵員。徵兵之所以成爲當前縣政府主要工作之一，自然有其客觀的需要。同時，目前的戰線是這樣綿長；戰區是這樣的遼闊，到處都成戰區，到處都是前線，如果兵員的補充，完全仰仗於後方，那末在純粹的後方區域已經日益縮小的今天，恐怕無法負擔，前線各縣之必需徵兵，實是無可否認的事。並且，從理論上來說：爲了不留一草一木子敵

人，自然更不應留一個壯丁給敵人，戰區或附近戰區之壯丁，根據人力的堅壁清野這個原則，不僅應該徵集，而且最好能夠掃數轉移後方，補充員兵。

我們並不否認上述理論，有其相對的正確性，但是，在實施征兵時，所得結果却完全相反，安吉於九月，十一月先後奉令征集壯丁，每次各三百名，由於行政機構的不健全，民衆對兵役意義的不了解，抽籤的不公（大部均未抽籤）僑待出征軍人家屬辦法的未能兌現，地方雜色部隊之從中阻擾（如一開徵集壯丁，壯丁便紛紛加入游擊隊，等徵集完畢，又復回家）因此，兩次徵集壯丁，雖然勉強完成任務，然而由於上述原因，弄得天然人怨，整個社會秩序形成混亂，甚至三五成羣，紛紛避入敵區，而社會生產，無形停頓，影響之大，實在難以想像，聽說這種情形，不僅安吉如此，其他前線各縣，也有相似現象。

理論與事實這種相互背馳的原因，自然由於實踐理論時許多條件未曾具備的緣故。然而活生生的事實絕對不容我們忽視，而且，這個問題我相信在其他縣分，一定可能有同樣的情形。

以我們這次辦理徵集壯丁的經驗，參照前線縣份的實際情形，我們以為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解決：

第一、爲了澈底牽掣敵人，消耗敵人，

變敵人的後方爲前線，戰區壯丁，應完全停徵，一面派得力人員，潛入戰區，編組部隊，發動武裝鬥爭。

第二、附近戰區之前線各縣，應加速加強政治工作，暫時予以免徵，減徵，緩徵，使消有準備整頓期間，武裝民衆，加強抗戰力量。

（四）教育文化工作

教育文化工作，本來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正因爲目前安吉整個社會還不是一種正常狀態，教育文化工作自然難以迅速展開，然而這是一個危機，不僅許多學齡兒童，知識青年都在感受失學的痛苦，就是我們本身，也覺得好像生活在沙漠裏，缺乏精神上的食糧。

自然，我們不能等待社會秩序復元以後才着手進行教育文化工作，我們必須在現有的條件下，在動的過程中開展工作，這裏的教育工作不一定在學校裏，不一定有課本不一定有教室，而預備流動的不拘形式的舉辦一些規模較小的露天學校，街頭小學，創辦壁報，油印一些通俗的東西，廣泛地散播到羣衆中去，使民衆的意識不致模糊，使民衆明瞭，在目前這一困難的情形下，依然進行着我們的教育文化工作。

（五）民衆組織與民衆武裝

集體冬耕

——龍泉冬耕工作團特寫——

「我們要坐飛機！」

夜里，嵌在天壁的星星，在寒風里顫抖的北風，我們借了細弱的星光，辨別崎嶇的山道，田塍。那個麻臉的彪形漢子，顯然有點怕冷的樣子，縮起頭頸，把衣領遮張了雙耳，但嘴里却咕嚕着：

「媽的：今天吃的飯，像子彈那樣硬，要這樣，力氣怎麼用得出？」

「下次再煮生米，滾滾那個廚房！一戴頂破軍帽，說時使勁把圍巾往後一擦。從側面望過去，爲認得出是歌頌隊的隊員。」

從金沙寺上山，不上一里路，就是平坦的田野了。因爲下山時跑得太急，現在走上平路，二十多人全喘着氣，脚步拖慢了。

「指導員，拿了被褥在哪里集合？」麻臉漢子又忍不住開口了。

「大希農（大家）在民教館集合！」我把嗓子提得很高，用不正確的龍泉腔，「要快！」

「指導員，我們東昇鎮要坐飛機！」

「噯！坐飛機？河南鎮今天做得頂多，東昇鎮烏龜倒有希望。」很快的有人反駁。

爲了使耕種在六天內完成，特別用了飛機，否則就是汽車或烏龜；因此耕種別誰坐飛機，否則就是汽車或烏龜；因此耕種別烏龜。

烏龜。他們層層溜，但誰也不甘心當烏龜。

「阿六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指導員，明天我們人一齊，還怕飛機不成？」

「麻臉恨地吐一口唾沫，不服氣的說：『於是，那個被叫阿六的不作聲了。』」

把面大桶邊閃爍的火光變大了，先可囑大家

要迅速集合。

組織民衆，武裝民衆，這在抗戰的現階段，已成爲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務。我們一切努力，應該是爲了廣大民衆力量的發動。但是，這一點却使我們感到失望。民衆組織在安吉安是非常脆弱的除開相溪方面有一個戰時青年勞動服務團以外，看不到一個工作團體，雖然安吉已經遭受過敵人四度的進擾，民衆抗戰的情緒相當高漲，然而因爲一向對這一工作的忽視，因此依然還在散漫無組織中。

不過，安吉民衆組織之不易着手，却也有它的客觀條件，這主要的是由於：

一、住民藉貫的複雜，相互間沒有聯繫，沒有了解。

二、人口的稀少，村落的零星散漫，使羣衆一向處於孤立狀態，團結的形式與內容，羣衆都沒有正確的了解。

三、幫會（大刀會，紅槍會等）的組織在這裏有特殊的勢力，一般羣衆很難從迷信的落後的組織形式中解放出來。

四、由於敵人四度進擾，大部分有戰鬥意志，戰鬥力的都紛紛外流。

基於上述原因。這裏的民衆組織要採取特殊形態，目前我們正着手於知識青年的組織，想先從組織青年着手，以青年爲核心，爲動力，進而展開整個組織民衆工作。

談到武裝問題，實在使人太失望了，與、長與陷淪後，已經一年了，在這

中，應該生長出堅強的隊伍來，但是，這兒武裝部隊的混亂情形，一直到現在已存在着，所謂游擊隊，實際上是「游吃隊」，「游劫隊」，「老刀牌」，民衆不但沒有好感，而且見了害怕。

部隊脫離民衆，是沒有辦法進行戰鬥的，這種例子。到處都可以看到，最近朱×部隊的慘遭失敗，正是由於對民衆工作的疏忽，在這裏武裝部隊如果得不到民衆掩護，是絕對無法繼續生存的，這個問題，我們認爲太嚴重了，究竟應該怎樣改造，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對於一般民衆的武裝，已開始進行了！因爲以前許多編組民衆武力的人，往往把民衆的槍驅走，甚至強取豪奪，搜刮民強，結果，民衆的槍都深藏起來，不肯拿出來用；因此，我們現在提出「槍不離人，人不離地。」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效果是非常良好的，民衆現在都願意拿出槍來，光是梅溪一區，現在就可以編起一個大隊。目前全縣正在大規模編組民衆抗敵自衛義勇隊，這種隊伍是不脫離生產的，按照保甲系統實行編組，將全縣自

一、小小的紛擾

黑暗尙逗留在屋內，起床的號聲響了。稻草堆裏索在騷動，團員們從溫暖的被窩裏鑽出來，像破了殼的雞，抖擻地披上衣服。

「東昇鎮集合！」隊長揮揮手在喊。手裏捏了毛巾，雖然瓦上鋪着薄霜，北風帶着刺到上臉，但每個相燥的臉上却掛着興奮的微笑。

點名時也能聽到清脆地答聲「有！」不過有的只「唔」了一下，於是大家露出黃牙笑了。

「爲什麼不加入糾察隊受訓呢？」赤雙脚的團員自傲地說，顯示出自己是取過訓練的。

浸着冷水燙臉雖然不習慣，但大家這樣做，也終於跟着擦了，誰都沒半句話。

吃飯了。廚房把三罐青菜擺在地上，旁邊置着兩籠熱騰騰的飯。團員們分排成三行，捧着碗筷，一聲開動，爭着向籬邊擠。

「媽的！飯又是生的！」首先嚐到的喊了。

「大家不要吃，打廚房！」麻臉第一個響應。幾百隻忿怒的眼睛射向廚房，有的索性連碗也擲了。

突然組織股長把碗筷舉得高高的喊道：「大希農勿要吵！下次罰他一定煮好，！」

「邊說邊盛滿了一碗，擡着往下嚥。」「生！」

「噲咧着嘴，把一飛機」兩字，要坐飛機時！一切喧嚷都停止了。有些醜股長吃得怪，盛飯去了；餘下的覺得只念着一飛機」；只



二千人(估計全部編組起來時約有一千五百人)民衆都踴躍參加,而且,有幾個保區或立時,有許多青年婦女,也前來參加編組。我們以為只要我們誠意地去武裝民衆,這個工作是並不難進行的,這些編組起來的義勇隊,在平時可以自衛幫助正規軍的不是,戰時可以負擔掩護,擾亂的工作。我們以為是前線各縣工作中的一個主要部分。

(六) 怎樣解決幹部荒

幹部對於工作的重要性,祇要從「幹部決定一切。」這句名言裏就可以看出來,特別是安吉這樣一個地方,工作正在發動與開關,格外感到幹部的需要,幹部的缺乏,就直接妨礙工作的展開。

本來,我們一行人,約摸也有三四十個,但是,總是感到不夠分配,有的時候,各部門往往因為搶一個幹部,大家弄得不高興。有的時候,明明工作可以展開而因為缺乏幹部,只好讓工作暫時在停頓狀態,例如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編組的義勇隊,縣以下各級組織(如區隊,鄉隊,保隊),都因為沒有大批得力的幹部,不能夠很快的進行進一步的訓練工作,這損失是非常大的。

這一帶的地方幹部特別少,知識青年大都向外流,我們很難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幹部,吸收幹部,這情形,同後方的各縣是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正在請朋友們介紹一些人來,同時,更希望努力救亡工作的青年同志,大批地到前線來,另一方面,爲了我們的工作更深入,根本上解決幹部的恐慌,決定舉辦

變敵人的後方爲前線,戰區壯了,應完全停徵,一面派得力人員,潛入戰區,編組部隊,發動武裝鬥爭。

第二、附近戰區之前線各縣,應加速加

始工作,暫時予以免徵,減徵,緩徵,到這裏工作才一個月,我石裏上更開闊了。倒使人有點覺得戀戀不捨,上面所說的工作,我們是根據三個月中心工作計劃進行的,以現在的情形來看,我們是能如期完成工作的,正在以急迫的速度開展工作的時候,我們又要離開這兒,連三個月都不能做到頭,實在是太短促了。

但是,我們畢竟是很幸運的,我們居然有機會可以更向前進了,吳興,那才是我們頂理想的工作地點啊,我們能夠從前線更往前跑,進入火線,是每個人都引爲滿足和光榮的,不是嗎?黃主席政治進攻的口號,正須要我們成千成萬的青年來具體執行,只有拿實際的行動,實際的工作來表現,才是真正執行了政治進攻的任務,才是真正擁護戰時政治綱領,擁護堅決抗日的黃主席。

前線與火線,也就是安吉與吳興,工作條件是不同的,工作方式自然也不同,那裏展開的鬥爭,將是更艱苦,但是,有一點是始終應該把握住的,就是注意到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和擴大,有許多人以為前線很單純,可以大刀闊斧的幹;那種痛快主義是不正確的,必須堅決執行統一戰線,工作才能順利展開。

「我們先去了,你們快跟上!」朋友們!再會吧!在火線上!

一九三八,十二月於安吉

集體冬耕

——龍泉冬耕工作團特寫

夜裡,鐵在碗裏的碗筷整齊。

「……只有六天,我們非「突擊」完不可。今天大家把碗筷帶在身邊,爲了節省時間,一律……生活指導員和團員,在田間吃午飯……希望大家坐飛機,不要做烏龜!」團員們忍不住低下頭嘆哧地笑了,但當仰起來望見隊長嚴嚴肅肅的臉時,又趕快收斂了笑容。

嘹亮的歌聲起了,鋤頭背上臂,一個個從金沙寺的大門口吐出來,分佈到四圍的田間去。陽光親熱地吻着他們健碩的身軀,漸漸隱沒在山坡下。

四、歡笑着回來

山麓梯形的田間,樹立着木牌,標明屬於那隊耕作。人們土灣了腰,鋤頭不斷的起落着,黑黝黝的泥土在翻動,歌聲震動着山莊田野,慰勞隊,婦長的,青年的一批一批的送着歌聲下田來,緊張的集體工作使大家忘記了疲倦,也忘記了一切。

傍晚,太陽下山背去了。隊長「集合!」集合!「今天我們東昇趕得快,坐飛機有希望!」我鼓勵大家說。

隊伍中有人在說:「一是要做烏龜,頂倒!」「嘻嘻……還對不住自己的老婆。」一連串的笑聲,從第一個拖到最後的一